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七編 第五冊

天一閣明代文獻研究(下)

柯亞莉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七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5冊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研究（下）

柯亞莉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研究(下)／柯亞莉 著——初版——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22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5冊)

ISBN：978-986-322-430-3 (精裝)

1. 文獻 2. 研究考訂 3. 明代

011.08

102014846

ISBN-978-986-322-430-3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五冊

ISBN：978-986-322-430-3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研究(下)

作 者 柯亞莉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年9月

定 價 十七編 20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研究（下）

柯亞莉 著



目次

上 冊	
圖 版	1
緒 論	1
第一節 天一閣及其藏書研究小史	1
第二節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背景和條件	10
第一章 天一閣創建者范欽考論	17
第一節 從政簡史	17
第二節 交遊考述	23
一、同年	23
二、同官	27
三、同人	34
四、同鄉	41
五、寧波地方官	48
第三節 藏書目的、藏書來源和書樓建成	53
一、藏書目的	53
二、藏書來源	57
三、書樓建成	60
第二章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主要內容及舉要	
(上)	63
第一節 天一閣藏明人奏議	63
一、天一閣藏明人奏議的內容	64
二、天一閣藏十四種明人奏議提要	67
第二節 天一閣藏明代政書	83
一、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的內容	83
二、天一閣藏十四種明代政書敘錄	84
第三節 天一閣藏明代傳記	105
一、天一閣藏明代傳記的類型	105
二、天一閣藏十二種明代傳記考述	108
第四節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文獻	121
一、天一閣藏明代科舉文獻概述	121
二、天一閣藏明代武舉錄探析	125

第三章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主要內容及舉要 (下)	135
第一節 天一閣藏明代地理類文獻	135
一、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的內容與體例	135
二、天一閣藏明代專志的類型及六種明代專 志考錄	139
第二節 天一閣藏明代邊疆域外史地文獻	146
一、明代邊疆史地文獻	146
二、明代域外史地文獻	153
第三節 天一閣藏明人文集	161
一、天一閣藏明人文集的特點	161
二、天一閣藏二十九種明人文集敘錄	165

下 冊

第四章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價值與意義	193
第一節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內容上的學術價值	193
第二節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版本特徵及其在版 本學上的意義	199
第三節 天一閣藏書的文化意義	206
第五章 天一閣藏書的散出及其庋藏情況	213
第一節 天一閣進呈本的散出	214
第二節 天一閣藏書在寧波當地的散出	217
第三節 天一閣藏書在上海的散出	221
第四節 結 論	228
附錄一：全祖望集中所見天一閣藏書研究資料輯 錄	231
附錄二：范欽交遊表	243
附錄三：天一閣散出之明代文獻知見錄	267
附錄四：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總目（初稿）	307
主要參考文獻	409
後 記	415

第四章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價值與意義

中國古代藏書家和藏書樓在保存文獻、促進學術和傳播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天一閣作為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其價值與意義因其獨具特色的藏書而更加彰顯。

第一節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內容上的學術價值

天一閣藏書的主體是明代文獻，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主體又是史部和集部文獻，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對其主要內容進行了闡述，並對其中的近百種明代文獻進行了重點分析。加上概述部分，總共涉及的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百餘種。總括而言，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學術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史料價值及史學研究價值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中有許多至今還是不太為人注意的珍貴材料，對《明實錄》、《明史》等官修史書具有訂補作用，由此可以解決明史研究中的難題，可以提出明史研究中的新問題，甚至可以開闢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史料的搜集是進行歷史研究的必要前提，要從事史學工作，必須詳細、全面地佔有資料，而明史史料數量很多，且較為分散，若非勤加蒐輯，很難窺得事情全貌。清朝修《明史》始於順治二年（1645）五月，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成書，乾隆四年（1739）七月刊成，歷時近百年，體例謹

嚴，被認為是除「前四史」之外最好的正史，然而《明史》在史實方面卻存在不少闕失。《明史》的訂補文獻自清代開始便已出現，清人王頌蔚（1848～1895）《明史考證攷逸》和近人黃雲眉（1898～1977）《明史考證》等就是訂補《明史》的專著。已故明史專家吳晗（1909～1969）曾專文指出《明史》之缺佚、誤文、套句、重出、互異、矯誣、事訛、簡略、偏據、舛奪等十方面的闕失〔註1〕。《明史》存在失實失誤的原因之一在於其取材有限，也就是說其史料來源主要是《明實錄》，而《實錄》採自詔書、奏議、政書等，其間輾轉差訛之處在所難免。天一閣藏明代文獻則保存了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原始檔案材料，不少就是《實錄》的材料來源。如《萬代公論》記載高拱「隆慶改革」中的兩件大事，就是《實錄》纂修的直接取材之源。又如《四庫提要》著錄天一閣進呈之《公侯簿》，云：「前有嘉靖九年（1530）公牘一篇，又有嘉靖二十六年（1547）公牘一篇。蓋吏部驗封司所存冊籍，相續編纂者也。」〔註2〕又如阮元《天一閣書目》著錄劉定之《否泰錄》，云其「紀正統北狩及回鑾時事。《否泰》附錄內有李賢《天順日錄》、《于少保公奏議十卷》及正統季年、景泰初年奏報二錄，彙為一書，蓋史館所輯以備纂修《實錄》之用者」〔註3〕，明確是史館修《實錄》之底本。2010年出版的《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影印天一閣現存明代政書共54種，其中44種未見他書著錄，未見有其他版本和流傳，為海內外僅存之孤本，整理者在提要中屢用「原始檔冊」、「檔案文書」、「珍貴檔案文獻」、「傳世罕見」、「不可多得」和「第一手資料」等字眼來確定其文獻價值。因此，珍稀的檔冊性質，決定了天一閣藏明代文獻可補史之闕，糾史之誤，證史之文，是明史研究的直接的一手的材料，是明史的史料庫。

以明人奏議為例。清代史家趙翼（1727～1814）嘗言：「《明史》於諸臣奏議凡切於當時利弊者多載之。」〔註4〕然而為史體所限，《明史》人物列傳一般節錄或者概括傳主的奏疏內容，不能全文引用，天一閣所藏明人奏議則為一次文獻，內容完整，材料齊備，大大超出正史與實錄所載。如前所述，《蠡遇錄》為《明史》史料來源，《浙江海防兵糧疏》與史互有異同，《張簡

〔註1〕 吳晗：《吳晗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57～166頁。

〔註2〕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第690頁。

〔註3〕 〔清〕阮元等：《天一閣書目》，清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920冊，第64頁。

〔註4〕 〔清〕趙翼：《陔餘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60頁。

肅公奏議》、《孫穀菴奏議》、《總督採辦疏草》、《戴兵部奏疏》等可補史之闕略，與史相參，而《郊議錄》可以證史，《恤刑錄》、《恤刑疏草》等是原始審錄資料的彙集，可以補史之空白。而且奏議還是瞭解明代更廣泛的社會歷史情況的原始材料，如《恤刑題稿》「對於研究民間宗教也頗有價值」，「對福建地區的風習與社會亦多有展現」〔註5〕；《審錄廣東案稿》「對於研究明代的海禁在下層社會所造成的影響頗有價值」，「對於研究明代廣東的世俗民風，亦多有可採者」〔註6〕，而這又非正史所能容納的內容。

再以明人文集為例，天一閣所藏大量內容豐富的明人文集不僅較為細緻地描述出明代文學各方面的發展狀貌，是研究明代文學——主要是詩文——全盛時期的一手材料，而且明人文集各種序跋和相關內容又提供了大量名不見經傳、卻又活躍在歷史舞臺上的明代人物的直接史料，是瞭解明代歷史和明人社會生活的重要材料。如陳德文及其《石陽山人病詩》、《石陽山人蠡海》，郭鳳儀及其《均奕集》，賀甫及其《感樓集》，雷鳴春及其《雷氏白雲樓詩集》，林時及其《介立詩集》，張治道及其《太微詩集》、《太微後集》，朱拱樞及其《樵云詩集》等等，這些人物和他們的文集都是正史中所未曾涉及的，而從這些文集及其他相關文獻中不難發現，在當時的文學史上他們是有一席之地的。

若再將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總目與《明史·藝文志》相比較，其學術價值更加凸顯出來了。舉數字說明：天一閣藏明人奏議 123 種，其中僅 11 種被《明志》著錄；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 435 種，其中僅 95 種被《明志》著錄；天一閣藏明代科舉文獻 528 種，無一種《明志》著錄；天一閣藏明代傳記 180 種，其中 46 種被《明志》著錄；天一閣藏明代政書 172 種，其中 21 種被《明志》著錄；天一閣藏明人別集 570 種，其中 128 種《明志》著錄；天一閣藏明代總集 245 種，其中僅 38 種《明志》著錄。《明志》開創了正史藝文志著述一代文獻的先例，它將《千頃堂書目》刪繁就簡，著錄有明一代著述凡 4633 種，是研究者查找圖書文獻、進行明代學術文化研究的重要工具書，而大量的天一閣藏明代文獻卻被《明志》失收，《明志》的學術價值因之大打折扣。天一閣藏明代文獻則以實物向人們展示被人們遺忘卻未曾被歷史湮沒的有價值的文獻。

〔註5〕《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20冊，第375～376頁。

〔註6〕《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20冊，第497頁。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內容作為珍貴的明史史料，具有訂補官修史書的價值，而且其自身也不乏史學上的研究價值。如解決明史研究中的難題，《總督採辦疏草》、《北京建殿堂修都城獻納事例》和《皇明藩府政令》分別可以使明代採木工程的研究、明代捐納制度的研究和明代宗室制度的研究中的疑點問題迎刃而解；如提出明史研究中的新問題，《河南管河道事宜》提出治河過程中要節省修河之費、減輕河夫之役的問題，《浙江總兵肅紀維風冊》提出萬曆初年海防安定之後沿海軍隊的改革與整頓的問題，《省愆錄》提出禦邊過程中的「絕覘」即防治奸細的問題；如開闢明史研究的新領域，明代武舉錄中所關涉的明代武舉制度，明人文集中所關涉的明代地域文學（如浙江、吳中、江西、閩中）、宗室文學（如江西宗室）、家族文學（如閩縣陳氏、武定侯郭氏）、唱和酬贈文學（如祝壽、遊覽）和某些詩人群體（如以瑞昌王朱拱樞為首的江西詩人群）等問題，都是明史研究者至今尚未發現或開拓不深的領域。可以說，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史學研究價值是其潛力之所在。

（二）實用價值和現實意義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內容多關係國計民生，有裨實用，具有經世致用的現實意義。

天一閣藏奏議類文獻是明人關於當代各種社會問題的議論和解決的對策，如《焚餘集》是明代財政的彙報，《兩河經略》是治理黃河工程的方案，《張簡肅公奏議》、《江西奏議》和《南贛督撫奏議》分別是安定山西、江西和南贛等地的實策，《浙江海防兵糧疏》和《戴兵部奏疏》分別是對海防和邊防的籌畫建言，《恤刑錄》和《恤刑疏草》是各種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審判結果，而且這些奏議確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和效用，是實用之言。

政書類文獻是明代的各項法令和規制，如《河南管河道事宜》是治河方略，《皇明藩府政令》是宗藩法規，《慈谿縣丈量過田地實總》是寧波府均平田則運動時的文冊，再看看《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中輯入的明代政書及其提要，可以得出結論，這些文獻對於透視明代政務運作的實際過程確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明史專家萬明評價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發掘政書中豐富的治國理念與實踐，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既有學術價值又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註7〕

〔註7〕 萬明：《天一閣藏明代政書及其學術價值》，《中國史研究動態》第3期，2008年，第9頁。

傳記類文獻提供了明代各種類型歷史人物的生平資料，不僅有當代名人的傳記，也有不見於正史記載的地方人物傳記，這些傳記資料是同時代人所作，包括傳、年譜、墓誌銘、誥敕、碑、序、祭文、誄文、像贊、書信、奏疏、日記等各種體裁，更加鮮活而生動，這些人物個體的生平事迹和言論，具體地展現了明代社會的風俗民情。有些人物的傳記，還是家族史的珍貴資料，或是家譜纂修的取材來源，體現了家族的傳承史。發掘傳記文獻尤其是家譜的精神實質，是維繫家族乃至民族的紐帶，有利於在家族成員之間形成強烈的自豪感、認同感和歸屬感。

明代地方志是各地方的地理、風俗、人情、政務的系統著述，天一閣現藏二百餘種地方志，是明代及其以前社會歷史地理的一手資料，也是方志學的重要研究資料，而各種山水志、寺院志、書院志、遊記等又是有關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旅遊文化和教育文化等的難得資料。在文化產業方興未艾的今天，各地追根溯源，充分發掘地方志的內涵，使之成為各地文化旅遊的歷史依據，對促進地方史的研究和區域經濟的發展頗有裨益。

明代各類科舉文獻紀錄了大量通過科舉考試的明人的資料，承載著明代的科舉制度文化的內涵。天一閣藏明代科舉文獻具有連續性、集中性、系統性的特點，不僅可以補史，而且可以通過量化分析，探究諸如明代群體的社會流動，中舉和中式之人的籍貫、錄取比例、地域分佈，明代八股文的文體流變和評價標準等問題。寧波市慈谿縣學者沈登苗說：「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題名錄的精華是《登科錄》，《登科錄》的核心內容是『進士家狀』，若充分挖掘之，定能大大豐富科舉學、人才學、人文地理學、教育史等內涵，發揮其應有的價值。」〔註8〕應該說，會試錄、鄉試錄和武舉錄等均能發揮此種價值。

明代邊疆和域外史地文獻反映了明代的邊疆和域外形勢，記載了明朝的治邊之策和外交關係，具有很大的現實和借鑒意義。

對大量的明人文集進行個案的分析和整體的觀照，不僅有助於明代文學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使明人個體和群體的思想意識、生存方式、生活狀態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明人總集中以記遊為主題的唱和聯句

〔註8〕 沈登苗：《就明代進士祖上的生員身份與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閣藏明代進士登科錄為中心》，《科舉與科舉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第113頁。

詩，又為地方的旅遊文化增添了歷史意蘊。

總之，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內容著重的是當今現實的社會問題，能更為廣泛、更為深刻地反映了當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吳晗在《江蘇藏書家史略》的序言中說：「藏書之家，插架亦因之愈富，學者苟能探源溯流，鉤微掘隱，勒藏家故實為一書，則千數百年文化之消長，學術之升沉，社會生活之變動，地方經濟之盈虧，固不難一一如示諸掌也。」〔註9〕藏書家之故實是反映文化、學術、社會生活和地方民情的一面鏡子，藏書家之藏書更是當時文化、學術、社會生活和地方民情的真實寫照。范欽的藏書理念是實用、經世，其天一閣藏書就是這一理念的結晶。《四庫提要》的編纂者這樣評價天一閣進呈之《兩河經略》：「與所作《河防一覽》，均為有裨實用之言，不但補史志之疏略，備輿圖之考證已也。」〔註10〕以「實用」為價值取向的四庫館臣高度重視此書，將之全本抄入《四庫全書》，說明天一閣藏書的實用性正與之相合。

明代理學盛行，理學大體是一種心性之學，因此後來招致「遊談無根」、「空疏無用」之譏。而與此同時，明代經世實學也在興起，這不僅表現在天文曆算、農學、醫學、藥學等方面的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而且也應該表現在明人對社會現實有清醒的認識，並竭力補偏救弊，明代在社會政治層面上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明代很多理學家都是政績顯赫的政治家，如王陽明、歐陽鵬、徐階等，明人的意識形態和對現實問題的認識不是統一的、對等的。漢代王充（27～約97）曾這樣批評當時的儒生：「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以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註11〕知古、知今之論後成為衡量治學之高下的標準。黃侃（1886～1935）談論明清學者治學的弊病時就說：「清人治學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學之弊，知今而不知古。」

〔註9〕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18頁。

〔註10〕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五，第500頁。

〔註11〕 北京大學歷史學《論衡》注釋小組：《論衡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715頁。

〔註 12〕明人當然並非知今不知古，但確實更注重當下，更著重現實，范欽及其天一閣藏書正是這種實用、現世精神的直接體現。

總之，從內容上看，天一閣藏明代文獻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研究價值和實用參考價值，這是天一閣藏明代文獻主要的學術價值。

第二節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版本特徵及其在版本學上的意義

天一閣藏書中，宋元舊刻寥寥無幾，絕大多數是明刻本和明抄本，當代文獻的刻本和抄本更多是精美絕倫的珍品。羅振常《天一閣藏書經見錄》中描述天一閣藏書的版本時，多用「精」字來形容。所以張秀民說：「天一閣舊藏散在國內各館者，不論印本精抄，無不被視為珍本。」〔註 13〕天一閣藏書特別是其明代文獻，應該是有版本上的某些特徵的。趙萬里曾自信地斷言：「我可以說，凡是寧波舊書肆裏遇著暫白乾淨的明刻白棉紙書，十之八九，都是天一閣的遺產。天一閣的書，很少有印記的，但是無論它改了裝，我們能辨別這本書是不是天一閣的故物。」〔註 14〕經眼的天一閣藏書多了，對天一閣藏書的特徵就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就能一眼看出某本書是不是天一閣的故物。再者，范欽是藏書家，也是刻書家，曾校刻明袁凱的《海叟詩》、明王謐的《王彭衙詩》、明熊卓的《熊士選集》、晉阮籍的《阮嗣宗集》和宋司馬光的《稽古錄》（圖 6），還彙刻《范氏奇書》二十種（圖 5），范氏刻書無論字體、版式，都令人賞心悅目。既如此，范欽也是鑒賞家，能鑒別版本的優劣高下。所以天一閣藏書的版本應該是有群體性特徵的，是值得歸納總結的。要探討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版本特徵及其在版本學上的意義，需從明刻本和明抄本兩方面來看。

（一）明刻本

1.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刻本的出版時間跨越有明一代，而以嘉靖本最

〔註 12〕張暉：《量守廬學記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第 4 頁。

〔註 13〕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77 頁。

〔註 14〕趙萬里：《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8 卷第 1 號，1934 年，第 108 頁。

多。繆荃孫於 1909 年登閣觀書，見「列櫥分類，每類止數十本，然皆嘉靖前書。刻本無方體字，鈔本藍格綿紙，令人不忍釋手」〔註 15〕。此語不免以偏概全，但說明了天一閣本的多數情況。同時，既是涵蓋了明代各時期的版本形態，便可由此總結出明代版刻發展形制上如字體、裝幀、紙張等的某些特點，從而修正時人的某些定論。

謝國楨曾說：「從洪武到正德以前的明代初期，寫刻精楷漸變為方整的軟體字，刻書的形式主要是墨口本和黑魚尾，所用印刷的紙張是較粗的白棉紙和黃色有麻性的紙張。如能掌握了這些特徵，就可以一望而知為明初的刻本了。」〔註 16〕時人概括明版書的特點是，洪武至正德是黑口、趙字、繼元，嘉靖至萬曆是白口、方字、仿宋，萬曆以後至崇禎是白口、長字、有諱等等〔註 17〕。而若將天一閣藏各個時期、各種類型的明刻本仔細分析，可知某些刻本的情形與此說是符合的，如永樂元年（1403）刻本《元史續編》（圖 7）為黑口，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商文毅公遺行集》（圖 8）黑口，嘉靖五年（1526）刻本《通鑑綱目前編》（圖 9）白口、仿宋，但實際上很多明刻本並不符合上述特點，如嘉靖元年（1522）刻本《奉使錄》（圖 10）、嘉靖十一年（1532）《南詔源流紀要》（圖 11）都是黑口、趙字，嘉靖八年（1529）刻本《吳山志》（圖 37）、嘉靖三十三（1554）年刻本《廬陵曾氏家乘》（圖 38）、隆慶四年（1570）刻本《萬代公論》（圖 39）雖是白口，但是楷書上版。《天一閣藏明代珍本政書叢刊》中所影印之天一閣藏嘉靖、隆慶及萬曆初年刻本大都楷書上版，嘉靖刻本《范司馬奏議》（圖 2）還是明刻寫體字本，萬曆中期以後刻本如《頻宮禮樂疏》的字體才有仿宋趨勢。

明代的版刻形式固然隨著時間的發展而變化，更多的與內容密切相關，又與主管部門即出錢主持刻書者直接關聯。明代政書尤其是公告、文書之類的文獻多大字楷書，直至萬曆初年仍是如此，如洪武元年（1368）丹徒縣刻《皇明制書》（圖 13）、嘉靖三十四年（1555）寧波府刻本《寧波府通判諭保甲條約》（圖 14）、萬曆五年（1577）福建布政司刻本《催徵錢糧降罰事例》（圖 15）和《守城事宜》等。

明人文集的版刻形式則多不拘一格，字體、版式不限，但多清朗工整，

〔註 15〕 轉引自駱兆平：《天一閣藏書史志》，第 332 頁。

〔註 16〕 謝國楨：《明清史叢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85 頁。

〔註 17〕 參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第五章第三節「明刻本的特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年。

如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王氏家藏集》（圖 16）、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本《蓉塘詩話》（圖 17）、嘉靖刻本《南華合璧集》（圖 18）以及明刻本《皇甫司勳集》（圖 19）、《李氏山房詩選》（圖 20）、《天池山人小稿》（圖 21）、《子威先生澹思集》（圖 22）〔註 18〕等，嘉靖刻本《歲稿》、隆慶刻本《尺牘清裁》（圖 23）和萬曆刻本《西青閣詩草》等都是楷書上板，書法頗為美觀。

明代各種試錄（圖 24）的版刻形制，成化以前還略有變化，弘治以後就定型了。以明代會試錄為例，洪武四年會試錄是半葉九行，上下黑口，單黑尾，四周雙邊，版心鐫「會」和頁碼；宣德五年半葉十行，版心無「會」字；宣德八年會試錄是抄本，半葉八行，白口，無尾；正統元年始又是刻本，半葉九行；正統四年是雙對黑尾；正統十年恢復為單黑尾；成化十七年版心依次鐫「會試錄序」、「會試錄」、「會試錄文」、「會試錄後序」，此後直至萬曆一直不變。

明代刻書還注重圖文並茂，最典型的就地方志，往往繪製地圖，附在書前（如圖 25），而其他類型的刻書為說明問題起見有時也會附圖，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船政》的書首附快船和平船式樣圖（圖 26），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營規》書末附營兵簿籍的冊式，坐營官、把衛總官的腰牌式，隊長、甲長和伍長的旗式圖（圖 27），明刻本《新編魯般營造正式》書中附方物架構圖（圖 28）。

至於裝幀，筆者所見天一閣藏明代文獻多為線裝，武舉錄形似蝴蝶裝，但是散頁，並未裝成。明代地方志，如趙萬里所見：「萬曆刻本占最少數，大部分是嘉靖或是正德、弘治間修的。紙墨精湛，觸手如新，多作包背裝，令人愛不忍釋。」〔註 19〕

至於紙張，天一閣藏明代文獻較多用白棉紙，也有竹紙的，還有皮紙的，另外還有少量的黃麻紙。

2.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該種文獻的初刻單行本，與後來編刻的版本不同，這樣在內容和版本上均有比較參考的意義。

《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中，《皇明制書》為南直隸鎮江府丹徒縣

〔註 18〕明刻本《子威先生澹思集》，沈津《書城挹翠錄》判斷為嘉靖刻本，《香港中文大學善本書錄》判斷為萬曆刻本。筆者案：此書撰者劉鳳生於正德十四年（1519），卒於萬曆三十年（1602），故此書似當萬曆所刻。又此書刻工為「劉溥卿」，劉鳳《續吳先賢贊》（萬曆刻本）亦為劉溥卿所刻。

〔註 19〕趙萬里：《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第 105 頁。

官刻本，是該書的最早版本，「不僅保存了文獻的原貌，而且有效保護了明代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註20〕；《余肅敏公奏議》為三卷本，與六卷本的內容編排有所不同，蓋為初出之本；嘉靖《重修問刑條例》是國內見到的第一個單刻本；《禮儀定式》為正德初新頒，增加了永樂二年至正德元年有關禮儀的新規定，不同於《皇明制書》本，它是單行本，自有其價值。

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中有 172 種是各地纂修的方志中最早、最初刻印的志書，舉世罕見〔註21〕。

再舉明人文集為例。如前所述，天一閣遺存和散出的《入魏稿入浙稿入晉稿入楚稿》、《還山詩》、《岳遊漫稿》和《池上編》分別是王世貞集、皇甫汈集、朱曰藩集的初刻單行之本。馮貞群早就指出：「閣中藏書初刻本居多，若謝榛《四溟全集》七卷、文徵明《甫田集》四卷是也，不能執後刻二十四卷、三十五卷本而疑其缺，他類此。」〔註22〕如天一閣舊藏《唐伯虎集》二卷，今藏臺灣，「刊於嘉靖甲午（1534），首有胥台山人袁袞序文，知即袞所輯刻。為本書第一刻本。所收詩文，皆銘心絕品，故卷帙頗寥寥也」，「此為四明范氏天一閣故物，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紙墨精湛，觸手如新，尚是最初印本。寅以才藝傾動三吳，流風餘韻，至今猶膾炙人口，此雖寥寥小冊，安得不以球璧視之，固非以其罕見為重也」〔註23〕。又如《費文憲公集》十五卷，今亦藏臺灣，「此天一閣故物，他本有題摘題合雜文刊行為二十卷者，則在此本行世之後矣」〔註24〕。《升菴南中續集》四卷，也是嘉靖初刻本，《阮目》卷四之三著錄為「綿紙，刊本，全用行書」〔註25〕，《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則云：「此本乃天一閣故物，尚是嘉靖間永昌初刻本，筆勢飛舞，蓋據手蹟上版，尤可寶矣。」〔註26〕如此形制特殊，已成為稀珍的藝術品，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臺灣所藏的《升菴南中續集》都與此本同版。

3.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版刻種類繁多，包括了明本的各種類型如中央政府的刻書、地方政府的刻書、私人的刻書和藩府的刻書等，同時又有自己的

〔註20〕《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1冊），第3～4頁。

〔註21〕參駱兆平：《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前言》。

〔註22〕馮貞群：《鄧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凡例》。

〔註23〕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十二），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82頁。

〔註24〕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十二），第73頁。

〔註25〕〔清〕阮元等：《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三。

〔註26〕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十二），第90頁。

特點。

天一閣藏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刻書，內容多是有關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規、檔冊文書類文獻。中央政府的刻書，如進士登科錄、會試錄和《禮儀定式》等一些皇明官書為禮部刻，武舉錄、《浙江海防兵糧疏》、《大閱錄》等書為兵部刻，《北京建殿堂修都城獻納事例》為工部刻，《都察院奏明職掌肅紀維風冊》為都察院刻，《營規》、《船政》等為南京兵部刻。地方政府的刻書，如應天府刻《應天府丈田畝清浮糧便覽總冊》，興化府刻《學政錄》寧波府刻《寧波府通判諭保甲條約》，江西按察司刻《軍政條例續集》，建昌府刻《雙忠錄》（圖 40），各府刻的地方志（如圖 29～33）等。

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私人刻書，就題材而言，以私人著述尤以明人文集為多，明代私人著述若要傳世，必須依靠有財力的刻書者將其文集梓行於世，如張治道《嘉靖集》為陝西布政使孔天胤刻，雷鳴春《白雲樓詩集》是唐藩朱宙楨刻，徐學謨《移虔稿》是江藩朱拱樞刻，《南明紀遊詩集》是雲南臨安府知府章士元刻，《張氏至寶集挽詩》是福建按察司僉事楊澤刻，或是後輩中有能力刻書者將其先人生前的著述刊刻，如《廬陵曾氏家乘》（圖 38）為曾氏族人、監察御史曾孔化刻，《感樓集》為賀甫之子賀慈、賀息刻，《定齋先生詩集》為王應鵬女婿陸激刻，《遊嵩集》是薛蕙之弟薛寔刻，《希壽錄》為呂本之子呂兌刻，《義谿世稿》由陳氏後人、定海知縣陳朝錠主持刊刻；以地點而言，天一閣藏江、浙、閩等地的私人刻本為多，像無錫、寧波、建陽等地的刻書。

天一閣藏明代藩府刻書，以江西藩府的刻本最多，如《題贈錄》和《麗澤錄》（圖 34）。還有少量的書院刻書。

可以說天一閣藏明代文獻的刻本既具多樣性，又具典型性，是研究明本的最佳資料。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張秀民應邀前去天一閣整理圖書，在此過程中天一閣本為之撰寫《中國印刷史》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他說：「一九七三年至寧波天一閣，明范欽天一閣為國內碩果僅存之惟一最古私人藏書樓。與駱兆平、邱嗣斌同志共同挑選新接收之大批圖書中善本，凡五旬，審定閣中善本凡一百六十八箱，剔出二十一箱，一箱平均約二十一種，得見不少明經廠本、藩府本、金陵、建陽坊本、活字本，亦有明、清抄本，隨筆記錄。」〔註 27〕

〔註 27〕張秀民：《中國印刷史·自序》，第 10 頁。